

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

夏德靠 著

中华书局

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

夏德靠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夏德靠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9.11

ISBN 978-7-101-14184-9

I.两… II.夏… III.古文献学-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IV.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24239 号

书 名	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
著 者	夏德靠
责任编辑	陈 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47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184-9
定 价	98.00 元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汉语类
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17BZW079)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两汉语类文献的含义及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41
第一章 两汉语类文献生成、类型及文体特征	47
第一节 汉代儒学复兴与语类文献的兴盛	47
第二节 两汉语类文献的生成及其形态	71
第二章 两汉奏疏体文献	85
第一节 奏疏体源流	85
第二节 汉代奏疏的兴盛	103
第三节 陆贾与《新语》	139
第四节 盐铁会议与《盐铁论》	190
第三章 乐语传统与《韩诗外传》的生成	210
第一节 汉初《诗经》训诂体式	211
第二节 乐语传统及其文献	225
第三节 《韩诗外传》的生成	253
第四章 刘向与《新序》《说苑》的编撰	294
第一节 从校书到文献编撰	294
第二节 “采传记行事”与《说苑》《新序》的编撰	315

第五章 “拟语录”与《法言》的制作	354
第一节 扬雄的文体实践	354
第二节 《法言》的文体特征	384
第六章 贾谊与《新书》的编纂	408
第一节 贾谊与《新书》	408
第二节 《事势》的生成及文体形态	429
第三节 《连语》《杂事》的编撰	452
第七章 纪传体与语类文献的嬗变	469
第一节 《史通》纪传体观念	470
第二节 《史记》纪传体生成	490
第三节 《汉书》纪传体的新变	535
第四节 《吴越春秋》的“传体”改造	587
结 语	629
主要参考文献	640

绪 论

两汉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首先主要表现为它真正开启了帝国文学之形态。^①秦帝国虽然终结三代以来的封建制国家形态,但在文学方面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实绩。这个任务要等到继起者汉帝国来实现,汉代文学确实在多方面展现新兴帝国的盛世气象,从而为后来文学的演进奠定可贵的基础。本书主要选取“语类文献”作为对象,希望通过对“语”这一特定文体的研究,借此来探究汉代散文的生成及演进历程,并进而为描绘汉代文学生态提供一些思考线索。

第一节 两汉语类文献的含义及研究现状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

^①徐兴无在《刘向评传》中对刘向、刘歆生活的政治时代称作“西汉帝国”或“汉帝国”,而不是按照史学界的习惯称作“西汉王朝”,他所谓的“帝国”是“特指战国至秦酝酿建立的以皇帝为国家元首的郡县制国家,以与夏、商、周三代以王(天王)为国家元首的封建制国家相区别”。(参氏著《刘向评传》,第2页注释2)本书沿用这个称谓。

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①所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意思是说后世文体都出自战国。为什么这样说呢？章学诚分析指出：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傲时君也。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②

可见，章学诚提出“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观点，主要说明后世文体的渊源，而并非强调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众多文体这样的事实。不同于章学诚，刘师培则明确使用“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③的观点来描述两汉时期文体发展状况。刘师培的意思很清楚，即认为两汉时期大致具备后世的文体样式。对于这一判断，我们又应该秉持何种态度呢？

一 两汉文体研究述要

班固在《汉书》中载录汉人的一些著述行为，如《淮南衡山济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第15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第17页。

^③劳舒：《刘师培学术论著》，第247页。

北王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①《贾邹枚路传》云“贾山，颍川人也。……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又云“邹阳，齐人也。……阳为人有智略，愤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又云“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枚乘复说吴王曰”，又云“皋字少孺。……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禘祝》”；②《扬雄传赞》云“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③班固在介绍当时创作过程之际涉及若干文体，如颂、赋、上书、箴等。倘若说《汉书》的这种描述还并不充分的话，那么，范曄撰写的《后汉书》所呈现的面貌就大不相同了。比如《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载“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冯衍“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

①《汉书》，第2145页。

②《汉书》，第2327—2366页。

③《汉书》，第3583页。

策五十篇”；^①《郑范陈贾张列传》载“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②《班彪传》载“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讯》、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③《蔡邕列传》载“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海》《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④等等。郭英德在《〈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文中“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依据，综合统计前述《后汉书》著录传主文辞著述的48条传记资料，一共著录了以下62种文体名称：诗、赋、碑、碑文、诔、颂、铭、赞、箴、答、应讯、问、吊、哀辞、祝文、祷文、祠、荐、注、章、表、章表、奏、奏事、上疏、章奏、笺、笺记、论、议、论议、教、条教、教令、令、策、对策、策文、书、记、书记、檄、谒文、辩疑、诫述、志、文、说、书记说、官录说、自序、连珠、酒令、六言、七言、琴歌、别字、歌诗、嘲、遗令、杂文”，对于这些文体，郭先生又从同体异名、文类泛称、句读有误、未详何体四个方面做进一步辨析，指出“《后汉书》48条传记资料实际著录了44种文体：诗、赋、碑（含碑文）、诔、颂、铭、赞、箴、答（含应讯、问）、吊、哀辞、祝文（含祷文、祠、荐）、注、章、表、奏（含奏事、上疏）、笺（含笺记）、记、论、议、教（含条教）、令、策（含对策、策文）、书、文、檄、谒文、辩疑、诫述、志、说、书记说、官录说、自序、连珠、酒令、六言、七言、琴歌、别

①《后汉书》，第961、1003页。

②《后汉书》，第1240页。

③《后汉书》，第1386页。

④《后汉书》，第2007页。

字、歌诗、嘲、遗令、杂文”。^① 据此可见《后汉书》文体著录的丰富性,也可见东汉时期文人丰富的文体实践活动。关于此点,我们不妨以《文选》《文心雕龙》来作比较。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到的文体有赋、骚、诗、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篇、辞、引、序、碑、碣、志、状共三十六类,“其中有的为《文选》所不收,而有的为《文选》所收,又不入此《序》”(傅刚 1996)。骆鸿凯在《文选学·义例第二》中说:“《文选》次文之体凡三十有八:曰赋,曰诗,曰骚,曰七,曰诏,曰册,曰令,曰教,曰策文,曰表,曰上书,曰启,曰弹事,曰笺,曰奏记,曰书,曰移,曰檄,曰对问,曰设问,曰辞,曰颂,曰赞,曰符命,曰史论,曰史述赞,曰论,曰连珠,曰箴,曰铭,曰诔,曰哀,曰碑文,曰墓志,曰行状,曰吊文,曰祭文。”^② 不过,据傅刚的考察,《文选》的文体分类应该是三十九类,这是因为“《文选》卷四十四‘檄’类中司马长卿(相如)《难蜀父老》一文,无论如何不应排列在钟士季(会)的《檄蜀文》之后。司马相如是西汉人,而钟会却是曹魏时人,这两人都是名人,照理是不应出错的。因此,《难蜀父老》一文也应单独标类,即‘难’与‘移’一样,都是《文选》中单独的文体。这样,《文选》实际文体类目就应该是三十九类了”。至于《文心雕龙》,从第六篇到第二十五篇论述文体,其篇题所列文体涉及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计三十三种。当然,这只是就《文选》《文心雕龙》整体而言的,二书实际上涉及的文体则颇为复杂,比如《文选》,“赋与诗

^①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71—74页。

^② 骆鸿凯:《文选学》,第22页。

又析为若干类。赋曰京都,曰郊祀,曰耕藉,曰田猎,曰纪行,曰游览,曰宫殿,曰江海,曰物色,曰鸟兽,曰志,曰哀伤,曰论文,曰音乐,曰情,凡十五类。诗曰补亡,曰述德,曰劝励,曰献诗,曰公讌,曰祖饯,曰咏史,曰百一,曰游仙,曰招隐,曰反招隐,曰游览,曰咏怀,曰哀伤,曰赠答,曰行旅,曰军戎,曰郊庙,曰乐府,曰挽歌,曰杂歌,曰杂诗,曰杂拟,凡二十三类。”^①又如《文心雕龙·书记篇》载:“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②可见“书记”之下又涵括谱、籍、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二级文体。这诚如学者所言,“分析或不无烦杂”,^③此点可暂毋论。整体言之,对比《文选》《文心雕龙》一级文体标目,不难发现《后汉书》著录东汉文体的丰富程度。然而,《后汉书》的这种著录是否反映东汉文体的实际,学人对此也并非没有疑虑,比如傅刚就说:“考虑到范晔是南朝人,故《后汉书》的文体著录或许带有南朝人的观念。”^④不过,郭英德推测说:“比较《后汉书》和《三国志》,有一点区别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三国志》仅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而不掺入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而《后汉书》对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则包括传主所著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汉书》据以为用的

① 骆鸿凯:《文选学》,第22—23页。

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57页。

③ 骆鸿凯:《文选学》,第23页。

④ 傅刚:《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传记资料,或许当早于《三国志》。”^①郗文倩(2007)更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证,最后指出:“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后汉书》的文体著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文体发展状况。”因此,刘师培“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的说法大抵指出两汉时期文体发展的实际。

(一)两汉文体释义与评论

两汉时期迎来文体创造的高峰,对此,人们除了在创作领域使用这些文体之外,还尝试从其他角度对这些文体进行解释、辨析。首先,需引起注意的是作者或接受群体对相关文体提出的认识。《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②刘邦君臣不仅对陆贾所呈奏议表示满意,而且还将这些奏议合集命名为“新语”。这种做法不但体现他们对“奏议”“语”两种文体内涵的认识,同时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又如《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作赋之法:“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③扬雄则在《法言·吾子》篇中指出: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

^①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74页。

^②《史记》,第959页。

^③熊宪光:《古今逸史精编》,第113页。

矣。……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①

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也写道：“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②扬雄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辞赋，可到了晚年，却对辞赋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辞赋由于过度追求靡丽言辞，最终导致辞赋失去讽谏的功能。班固对于赋的看法则不同于扬雄，他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说“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③又在《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

^①李守奎、洪玉琴：《扬子法言译注》，第16—17页。

^②《汉书》，第3575页。

^③《汉书》，第2609页。

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①整体看来，班固对赋持正面肯定之态度，他将赋视为“雅颂之亚”，肯定其“润色鸿业”的意义，以及“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讽谏与教化作用。司马迁在论述《史记》创作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③司马迁的理想在于“成一家之言”。班固在分析《史记》成书之际也表达其不满，在班固看来，《史记》最为诟病之处在于“是非颇缪于圣人”；尽管如此，班固还是沿袭刘向、扬雄以来的看法，高度称赞《史记》的实录精神。

以上只是简单胪列几则基于创作及接受角度有关文体认识的例证。对于两汉时期的文体来说，人们还从其他视角提出认识。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从文字学的角度提及相关文体的看法，比如“言部”中说“诗，志也。从言，寺声”；“训，说教也。

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602页。

②《汉书》，第2735页。

③《汉书》，第2737—2738页。

从言,川声”;“谟,谋也”;“论,议也”;“议,语也”;“誓,约束也”;“诰,诰也”;“说,说释也”;“话,会合善言也”;“记,正也”;“谚,传言也”等。^①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刘熙的《释名》,该书《释言语》论及“语、说、序、颂、赞、铭、勒、纪、祝、诅、盟、誓”,其《释书契》论及“奏、札、简、簿、牍、檄、传、券、策、约”,《释典艺》论及“传、记、诗、论、铭、诔、碑”等。比起《说文》,《释名》在解释方面更为细致,比如“语”,《说文》云:“语,论也。从言,吾声。”^②而《释名·释言语》指出:“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又《释典艺》篇说“《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以及“《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③尽管对“语”这种文体内涵的把握还存在欠缺,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语”的特征,这相对《说文》来说毕竟前进一大步了。当然,由于《说文解字》《释名》这样的文献,其关注的重心主要放在字义、字形等方面,因此,它们对有关文体的字词之解释,从文体角度来看,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并不意外。尽管如此,它们所做的解释,对于我们把握两汉文体之内涵还是不可或缺的。

(二)通论式文体论著有关两汉文体的论述

当然,我们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有关文体(特别是两汉文体)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文献,就研究对象来说,可以分为通论、专论两个层次。通论的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

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90—95页。

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89页。

③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①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②可惜曹丕、陆机只是对若干文体之特征进行总体归纳，刘勰《文心雕龙》就不一样，他对每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及创作特征都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工作，通过这种工作，揭示每一种文体的起源及发展状况、文体名称的含义及特点，并选录这一文体的代表作品，分析其创作要领与方法。比如《章表》篇分三层：一是讲章表的作用、起源和演变；二是讲两汉魏晋章表作者及作品；三是讲章表写作的要领。首先指出章表源于唐尧时期的“敷奏以言”之行为，战国时期称为上书，秦时改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③刘勰比较仔细地说明两汉时期章表的类型及功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分析两汉时期章表之代表作品，“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④最后分析章表的创作要求，“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章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

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97—1098页。

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013页。

③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06页。

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07页。